

我常常在想 应该有人为“铎兄”写一本传记 这对帮助人们了解“五四”以来新文学运动大有好处 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手法 只要内容翔实 他那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读者受到感染了——叶圣陶



郑振铎

中央文史工作委员会

郑振铎

民进中央会史工作领导小组

二〇〇四年十一月 北京



郑振铎 (1898 - 1958)

我常常在想，应该有人为“铎兄”写一本传记，这对帮助人们了解“五四”以来新文学运动大有好处。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手法，只要内容翔实，他那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读者受到感染了。

— 叶圣陶 —

目 录

郑振铎

坎坷的童年少年.....	1
求学京师，学生领袖	5
文学研究会的成立——走上文坛.....	13
第一部传世巨著——文学大纲.....	18
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的诞生.....	33
一座“俗文学”的丰碑.....	36
“战号”吹响了！	46
“匈奴未灭，无以为家”	49
“复社”逸事	52
战斗的笔.....	54
蛰居生活.....	56

坎坷的童年少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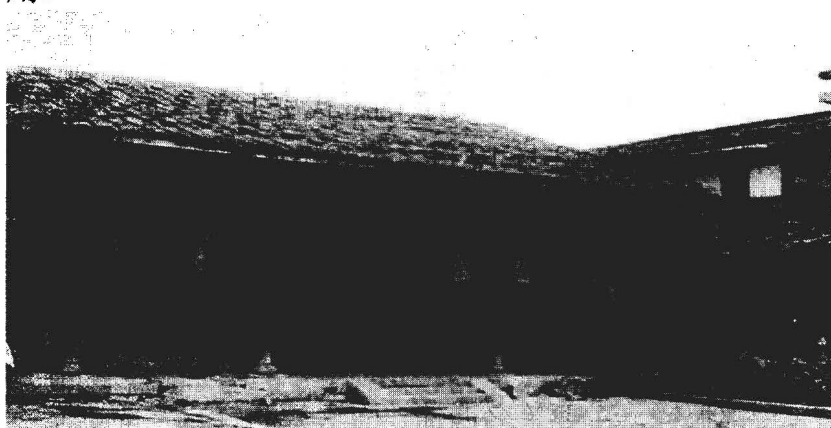
公元 1898 年，也就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“戊戌变法”的那一年的 12 月 19 日，在浙江永嘉县（今温州市）乘凉桥的一座叫做“盐公堂”的古老院落里，一个男婴呱呱落地。随着他一声清脆的啼哭，一颗璀璨的文坛巨星，从这里冉冉升起。这个男婴，就是后来成为“文坛一帅”的一代文豪——郑振铎。

郑振铎，主要笔名西谛、CT（郑与铎二字的英文缩写），也常用他的本名郑振铎。30 年代以后，常用“郭源新”作笔名，据说与他的母亲姓郭有关，也有一说是这三个字，与“郑振铎”三字的草书极形似被人误认，因此就将错就错了。

他祖籍本是福建省长乐县（今长乐市）首占村，后因当幕友出身的祖父，被委派做了铜山岛的海防小官，后来，又派到温州担任了主管盐政的“七品芝麻官”，举家便迁到了温州。父亲曾在苏州县衙当幕僚，后因病回温州家中疗养，不久便病故，这年郑振铎才七岁。不久祖父也去世了，从此家道中落。母亲、他和两个妹妹，

坎坷的童年少年

一家四口只得依靠亲友接济及母亲给亲友们做些针线活，如纳鞋底之类。过端午节时，便包些粽子，做些小布老虎，交给附近小杂货店去寄售，这样也可贴补些家用。



郑振铎祖居：福建长乐首占村义福房。他十分热爱自己的故乡，常以“长乐郑振铎”自称。

郑振铎八九岁时，母亲便把他送到县里城隍潭的一家私塾里去读四书五经。这时，家中日趋贫困，他到了冬天也是一身单薄的衣衫。日久天长，便患了慢性鼻炎，两行鼻涕常常不由自主地从鼻孔中挂下来。同学们嘲笑他，看不起他，给他起了个“鼻涕佛”的绰号。多数同学都不和他玩，只有夏承焘成了他的知己。郑振铎渐渐变得沉默寡言，大家在玩时，他总是独自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读书。只有夏承焘有时硬拉着他一起去池塘边

捞蝌蚪或是去古坟堆里逮蟋蟀，这时，他才又像是个孩子，脸上暂时有了一丝微笑。

夜间的生活是很寂寞的，那时还没有电灯，母亲坐在油灯下做着针线，郑振铎便依偎在她怀里，听她讲“蛇龙哥”等许多福州家乡流传的美丽动听的民间故事。母亲还给他唱很多福州长乐的歌谣，其中一首是这样的：

月光光，
照河塘，
骑竹马，
过横塘。
横塘水深不得过，
娘子牵船来接郎。
问郎长，问郎短，
问郎此去何时返。

郑振铎虽然听不懂什么意思，但母亲甜润的歌喉，像是催眠曲，听着听着，他便在母亲怀里进入梦乡，脸上含着一天中少有的微笑……母爱，那么温柔，那比蜜还浓郁甜美，令人心醉的母爱啊！



母亲郭宝娟。

郑振铎十二三岁时，母亲又把他送进了三官殿巷的永嘉高等小学。这时，同一私塾的许多同学也都转到了这里。大家依然看不起他，“鼻涕佛”的绰号又带到了这里。但是，使他欣慰的是，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师——黄小泉。他是一位和蔼、忠厚、热心而又十分开明的老师，从未见他责罚过学生，对犯错误的学生，他总是循循善诱，耐心加以开导。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朋友，从不以衣衫取人，对破衣烂衫的郑振铎，他从不轻视，相反，他独具慧眼，有时对这个被众人瞧不起的学生还格外爱护一些。逢到假日，他还常常带了郑振铎和夏承焘等人去春草池、飞霞洞等处游玩。

郑振铎最爱听小泉先生的国文课，枯燥乏味的《古文观止》等，到了他嘴里就成了十分有趣的故事，他讲起来生动活泼，有声有色，郑振铎从此爱上了国文。后来，他在《记黄小泉先生》一文中写道：“……假如我对文章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，小泉先生便是我真正的‘启蒙先生’，真正的指导者。”年终的时候，“鼻涕佛”名列前茅，那些平时看不起他的同学，虽是忌妒，却也不得不从此对他刮目相看。

桂花不知开了几遍，他在永嘉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后，考进了浙江省第十中学。常常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停学，但他还是以优异的成绩，读完了中学。

求学京师，学生领袖

1917年夏天，郑振铎来到了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心——北京，投靠在外交部做小签证官的叔父。不久，便考进了交通部所属的铁路管理学校（北方交通大学前身）。因为这一类学校，将来谋职业有保证；同时，学费较低。他几乎年年都名列第一，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免费学习资格。



1917年12月，郑振铎在亲友的资助下，考入了北京铁路管理学校。这是郑振铎（右一）当时和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同学合影。

叔父家住在东城，课余时间，他常到附近的基督教青年会办的一个小图书馆去看书。在那里，他认识了和他同样热爱文学的瞿秋白、耿济之和许地山等人。瞿和耿都是俄文专修馆的学生，他们常常借阅这个图书馆里的托尔斯泰、普希金等人的俄文原著。郑振铎在他们的影响下，也经常借些英文版的高尔基、契可夫等人的作品，贪婪地读起来。他们还组织了一个读书会，经常在放学后，相约爬到高大的明城墙上，拿出携带的花生、瓜子等，席地而坐，热烈地交谈起各自的读书心得，以及对社会，对时局的看法，直到日薄西山，都不愿散去。

这时，他们开始试译一些作品。郑振铎译的大多数是契可夫等人的剧本，并且编了一本《俄国戏曲集》，除了他自己译的剧本外，还收入了瞿秋白、耿济之等人的译作，交给商



课余时，郑振铎常去青年会图书馆读书，在那里结识了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瞿秋白、耿济之等人。图为郑振铎（左二）和瞿秋白（左一）、耿济之（右一）等人的合影。

务印书馆出版，得到了平生第一笔稿费。拿到稿费的当天中午，他走进了一家小饭铺，要了两个炒菜和两大碗饭，从没有那样“奢侈”地美美饱餐了一顿。随后，他又兴匆匆地跑到常去的一家书店，把余下的钱，全部都买了书，感到充实极了！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。

1919年，五四运动爆发。他被同学们推选为学生代表，和瞿秋白、耿济之、许地山等人，代表着各自的学校，并肩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。因为他是福建人，同时又被推选为“福建省抗日学生联合会”的领导之一。

这年夏天，军阀当局为了分散学生的力量，责令各校提前放假。六月初，郑振铎回到了温州。整个假期，他奔走于温州各校，参加各种会议，介绍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情况，发表演讲，并且和陈仲陶等人，以及各校爱国师生，先后组织了“救国演讲周刊社”和“新学会”，创办了《救国演讲周刊》和《新学报》，宣传反帝救国的意义，推动新文化运动。他除了积极参加编辑工作外，还亲自为《周刊》撰写了数篇战斗性强、旗帜鲜明的新闻报导；在《新学报》第二、三、四期上发表了《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》、《中国妇女解放问题》、《最高艺术的问题》（译文）等文章。

暑假结束后，他回到北京。应青年会之邀，在这年

的11月1日，又和瞿秋白、耿济之、许地山等人，创办了《新社会》旬刊。他执笔的《发刊词》中，道出了他们创办的宗旨，这就是“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。……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”。

在创刊号上，郑振铎发表了他的处女诗作《我是少年》和《灯光》。这两首诗一经问世，便引起了社会上强烈反响。其中《我是少年》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一首诗：

我是少年！我是少年！

我有如炬的眼，

我有思想如泉。

我有牺牲的精神，

我有自由不可捐。

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，

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。

我起！我起！

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。

我是少年！我是少年！

我有沸腾的热血和活泼进取的气象。

我欲进前！进前！进前！

我有同胞的情感，

我有博爱的心田。

我看见前面的光明，
我欲驶破浪的大船，
满载可怜的同胞，
进前！进前！进前！
不管它浊浪排空，狂飚肆虐，
我只向光明的所在，进前！进前！进前！

这首充满着勃勃朝气、奋发向上的精神的诗，发表后顿时受到社会上广大读者，尤其是青少年的欢迎，被誉为“当时年轻一代人的呼声”

（叶圣陶语）。它发表不久，就被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选集《新诗集》收入；后来，又被远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汉语教授的著名学者赵元任选作教材，并且他亲自朗诵，灌制成了唱片，一时间，唱遍大江南北，黄河上下，乃至大洋彼岸。

《灯光》写了一个在“深秋中夜，黑云四罩，风吹叶落，萧萧作响。一个人提着灯，在荒野中寻路迈往”的“孤零零”的夜行人，期盼着其他的夜行人和他



1919年11月，郑振铎和瞿秋白等人创刊《新社会》旬刊，在第一期上他发表诗作《我是少年》。

“共享”那“照着前途明白”的“灯光”。反映了年轻诗人，希望更多的人觉悟起来，在代表着先进思想的“灯光”指引下，共同为他们——他和秋白、济之等人——理想的“新社会”，“共向前迈往”。它虽是首散文诗，却也有着较鲜明的节奏感，读来朗朗上口，寓意隽永，也颇受读者喜爱。接着，他又写了《追寄秋白、颂华、仲武》、《微光》、《生命之火燃了！》等诗。

他最初的两篇小说，《惊悸》和《平凡地毁了一生》发表在1920年9、10月的《晨报》。《惊悸》描述了“我”在路上看见囚犯时心悸不安的心态和“我”在当晚梦见自己被绑赴刑场而出一身冷汗的情景。《平凡地毁了一生》描述了一个青年空有大志，却无真才，见异思迁，一心只想“做一个人上人的人”，结果一事无成。

后来，他又在1921年1月，他参与编辑的《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乙班毕业纪念册》上，发表了《一个不幸的车夫》，描写了一个人力车夫被有钱有势者的汽车撞倒后，痛苦而无告的悲惨命运。

这三篇小说，可视为他最初的试笔之作，艺术水准都不高，甚至还很幼稚。但却可以看出，每一笔都是饱蘸了“血和泪”来写的，从中反映出了他早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和“血和泪”的文学主张。可能是他自己后来，也觉得这几篇东西写得不高明，便暂停了小说的创作。

在《新社会》上，郑振铎还先后发表了《现代的社会改造运动》、《什么是劳动问题》等若干篇社会论文，反映了他当时“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”。由于这个刊物发表了郑振铎、瞿秋白等人许多宣传革命思想，揭露、批判旧制度和反动统治的文章，触犯了北洋军阀当局，只出了19期，就被京师警察厅查禁了。

在1920年8月，他们又出版了《人道》月刊。这个刊物和《新社会》的倾向的不同之处，在于更大力提倡人道主义，主张建立一个超国家、超阶级的博爱的社会。《人道》仅出版了一期，便因为该刊出资的青年会，怕这些年轻人再出什么乱子而借故资金困难，迫使其停刊了。

这期间他还参加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李大钊主办的“社会主义研究会”。这是一个包括了马克思主义者、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

在校期间，郑振铎便开始了文学创作，图为他发表的小说《一个不幸的车夫》。

[illegible]

者的成份复杂的秘密组织。虽然为时不长便解散了，但这对他早期的“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”和无政府主义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在文学活动方面，郑振铎在这期间还主要从事了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及介绍，撰写了《俄罗斯文学的特质与其略史》、《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》、《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影响》和《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·序》等论文。其中《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·序》则是他的第一篇重要的文学论文。这是他为耿济之、沈颖译的俄国短篇小说集而写。文章中，他不仅高度评价和介绍了流传到我国不久的俄国文学，并且初步提出了自己当时的文学观点，阐述了“文学的真价”，文学的“‘真’的精神”、“人的文学”、“平民的文学”、“悲剧的文学”等一系列重大的文学理论问题。其实，所谓“真价”、“真的精神”、“人的文学”等，也就是他和茅盾等后来所积极提倡的“为人生”的现实主义文学，也就是他后来提出的“血和泪的文学”。这篇序文是我们探索他早期文学思想和发展脉络的重要资料。

五四运动前后是郑振铎一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。这时期的种种活动，对他以后一生所走的政治道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